

当一个个空心村出现的时候，有这么一群人，从城市甚至国外，跑到偏远的山村。曾经惯于敲打键盘的双手开始触摸泥土，皮肤因和太阳亲近而变得黝黑，他们被称作“新农人”。

这群带着点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俯身土地之间，将现代的技术用到原始的土地上。奇妙的是，在他们身上，摩登的理念和回归本真的朴素愿望毫无违和地共存着。

“一定有一种生活，可以不再被时间或者金钱逼迫，能够让我们回归人类本质。”“新农人”周薇薇如此说。

本报记者 汪洸

雾霾逼我去村里

“我被雾霾严重打击到了。”在近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上，周薇薇这样讲述她离开城市的理由，“2011年的时候，北京雾霾特别严重，当时我就想，如果在村子里有自己的栖身之地，就不用忍受这样的城市生活了。”

那之前，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妞，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草原上和当地的牧民结识，迷上了这片土地。

2011年，在大雪封山之前，周薇薇和伙伴回到了内蒙古，圈下50亩地种玫瑰。

当时有一个张家口的朋友问她，你学农业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你家是农村的吗？答案也是否定的。“他说那你去农村不是开玩笑吗。听了这句话以后，我说对，我凭什么去农村生活，于是开始紧锣密鼓地参加有机农业的培训。”

周薇薇去台湾、去澳大利亚、去新西兰，和当地的农场主生活在一起，了解先进的生态农业技术。随着项目的不断完善，周薇薇的玫瑰园扩大到了300亩。

“一定有一种生活，可以不再被时间或者金钱逼迫，能够让我们回归人类本质。”周薇薇如此说。

“小毛驴”的生活方式

有人离开，有人归来。2009年，定居澳大利亚的梁紫琪回国，和她的合伙人一起，在山西省阳曲县大孟镇的150亩土地上耕种，从2009年到现在，5年过去了，梁紫琪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农民”。

在她的150亩土地上，从不使用农药防虫、杀虫，却依然将农作物的虫害降到了最低；在没有化肥乃至粪肥的土地上，仍可种植出健康高产的作物。这归功于她和伙伴倾心研究的有机种植体系，运用更加科学与自然的方式培养土壤，加强土地自身的生命力与抵抗力。

梁紫琪用一张张照片展示她种出的青椒、西红柿、茄子，“它们在最原始的，最自然的土壤环境中，感受星辰交替，吸收日月精华。”

“新农人”们带来的不仅是新技术生产的农作物，还有新鲜的生活、生产方式。

CSA，多数人并不知道的英文缩写词，意为“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在第二届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上，这个词被反复提起，这是一种城乡社区相互支持，发展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小区域经济合作方式。

一个戴着眼镜、身材消瘦的男人在论坛上引起不小的关注。

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黄志友在农村长大，2008年，他的团队北上北京创建了“小毛驴市民农园”。

黄志友黝黑的皮肤似乎也在证明他这些年来一直和土地在打交道。

采取“高校-政府-企业”三方共建模式的“小毛驴”，在农业种植方式上尊重自然界的多样性，遵循种养结合的原理，通过CSA的理念，将一个个画着小毛驴装着农产品的包装盒送进了社区和超市。

“CSA不单纯是有机生活或环保，背后更多的是我们和这个世界共处的一种方式。”黄志友说。

走，种田去！

城镇化浪潮中“新农人”回归乡村



“乡村文明复兴是对当代世界出现的城市与乡村两极文明失衡进行矫正的时代需要。”第二届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上发布了中国乡村文明复兴宣言，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中国乡村文明中心主任张孝德教授宣读了这一宣言。

站在现代西方文明的立场看，传统乡村文明代表着“落后”，是应该送入博物馆的文明。但在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看来，传统乡村文明是人类文明之根，他提出在更高的层面整合传统和现代的结晶，发展一种厚道的现代乡村文明。

乡村文明，等待复兴

本报记者 汪洸

农民失去了谈判能力

谈及乡村文明，与会的许多专家、学者都感叹，在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大潮中，乡村文明剩下的已差不多了。

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韩康说，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国家进入到了高速发展的30年，但在这30年中，中国乡村文明的空间也被挤压得非常有限。“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处于一个强势地位，农民面对乡村空间的压缩，几乎没有谈判能力。”

2006年，韩康在研究中国农村就业转移问题时就发现，中国城镇化发展出现了城乡矛盾内化的某些迹象。1996年到2003年，正是国内城市化快速扩张和大量占用农民耕地的高潮时期，耕地面积从19.51亿亩减少到18.51亿亩。7年中减少了1亿亩耕地，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耕地面积下降最快的时期。

已经89岁高龄的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小约翰·柯布则认为，长期以来，城市人自我认为的优越性一直根深蒂固，他们认为自己的日子比农村好，更认为农村是欠发达、不先进的地区，并且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农民。“农村在很多地方被城市所剥削，这也导致农村人想要逃离农村。”

两个“极不对称”的现象出现，韩康说，就是城市化占用耕地的增长和农村就业转移增长的比例极不对称，城市规模扩张和城市吸纳稳定居民的比例极不对称。

城市不是农民市民化的归宿

长期以来，理论界普遍认为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市民的最大障碍是城乡户籍制度。但韩康对这样的观点始终不认同。“要实现农民市民化，最大的障碍是生活成本的高昂和社会保障的短缺。”无论是住房，还是养老金、医疗保险等体系，眼下都难以解决4亿农民市民化这一难题。

所以韩康说，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都不是农民市民化的归宿。

面对这一系列的难题，张孝德提出了“记得住乡愁的乡村”这一概念。他认为，打造特色城镇化，最大的挑战不是在短期内实现更高的城市化率，而是要破解中国的乡村如何就地文明化。

但是，站在现代西方文明的立场看，传统乡村文明是应该送入博物馆的文明。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则认为，传统乡村文明是人类文明之根，他提出在更高的层面整合传统和现代的

结晶，发展一种厚道的现代乡村文明。

“后现代乡村文明，主张城市发展与乡村建设并重，城市繁荣与农业繁荣齐飞。”王治河说：“要发展一种都市与田园交融，工业与农业和谐共处的有根的生态文明。”他以世界生态建筑之父索拉里的瘦身城为例，使农民定居在一个完全城市化的地方，然后到临近的地方去耕作和种植粮食，最终实现将城市带到农村去。

目前西方社会正蓬勃兴起的都市农业运动也可看做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大洋彼岸的古巴可以说走在了前列，拥有20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遍布着200多个不使用化肥和杀虫剂的中小型都市菜园，这样的都市农业也为古巴创造了30多万个工作岗位，可以说做到了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农村教育现代化不是取消它

在许多专家、学者看来，乡村文明遭到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严重同质化。柯布在本届论坛上就指出，现在农村孩子们使用的教科书，教授的内容却是城市的内容，“这对中国，对世界都不利。”

一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教育正面临着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一个是学龄人口大幅度减少，小学生人数从最高峰1997年的1.4亿下降到2013年的9000万；第二个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在2012年的统计中就超过了51%；再者是农村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学校撤并的幅度几乎是学生减少幅度的13倍。

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杨东平直言，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要认识到农村教育的现代化不是取消农村教育，同样的城乡一体化也不是城乡一样化，农村教育不应该等同于城市教育，应该有其自己独特的价值。

杨东平认为，山西柳林县实验学校就实现了一所学校致富一个村，建立起了一个学习化的村庄，不仅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而且现如今还在教学中融入了新农村文明发展，让每个孩子离开高中的时候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

小约翰·柯布十分遗憾地说，现在美国已经没有乡村文明了，它在十几年前就被毁灭了。中国仍主要是一个传统社会，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发展抉择带给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柯布期望中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这不仅影响成千上万中国人，而且也影响到整个世界。